

社会主义的 历史和理论

爱德华·伯恩斯坦 著



東方出版社

社会主义的 历史和理论

〔德〕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马元德 严隽旭 彭金安 蔡 升译

東方出版社

根据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社 1901 年德文版译出

Eduard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WEITE AUFLAGE**

Akademischer Verlag für sociale Wissenschaften

Dr. John Edelheim

Berlin • Bern 1901

根据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社 1901 年德文版译出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SHEHUI ZHUYI DE LISHI HE LILUN

著者/[德]爱德华·伯恩施坦

译者/马元德 严隽旭 彭金安 蔡 升

版式设计/刘宝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 × 1168 毫米1/32 印张/12 字数/286,000

版次/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06-7/D · 21

定价 6.30 元

出版说明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是修正主义的鼻祖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一本论文集，由作者在1900年编辑出版。全书分三编。第一编收入伯恩斯坦在1890年到1896年间发表的几篇文章。第二编是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六篇论文。第三编是伯恩斯坦为自己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辩护的文章。

伯恩斯坦给第一编加上“金科玉律”的标题，企图以此表明这些文章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实际上从这些文章中已可以看出他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萌芽，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原来是1890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三篇短文）值得重视。

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六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公开提出修正。伯恩斯坦在编辑本书第二编时沿用了原来的总题目，所收文章的篇数也是六篇，但篇目不完全相同。删去了《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德国工业发展的现状》二篇，加进了两篇也是在这期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即《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并附作者为此辩护的《批评的插曲》一文）和《英国各政党和经济利益》。作者对这一改动未作说明，但显然是认为这样做更能全面反映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例如，《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原来

20166

是《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一文的第二节，并不属于《社会主义问题》之列，但是同其他几篇相比却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后来人们在论述伯恩施坦的著作中提到《社会主义问题》时，通常是指收入本集的六篇文章。

《社会主义问题》发表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激烈争论。伯恩施坦为了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在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此书出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代表大会上受到广泛的批判，考茨基曾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并以此为基础写成《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纲领》一书（1899年出版）。本书第三编所收的主要是伯恩施坦反驳考茨基的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各党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伯恩施坦的思想对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有很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党国际及所属一些党宣布信奉多元的民主社会主义，伯恩施坦思想也是它的重要来源之一。无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还是对于探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来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我们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翻译出版，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序 言

现在我从历年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和专论中选出若干篇，汇成文集，跟广大读者见面。我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些作品包含着充分的发人深思和澄清问题的材料，因而以这种形式重新发表是有理由的。

如果说是这个假定鼓励我编选这本文集，那么在选择编入文集的文章时，确实又有一些个人的动机。我近来发表的作品遭到种种批评，这就使我想到以编集我的各个时期的政论文章的办法，来反对那种认为这些作品中流露出我突然放弃了自己以前所承认的观点论调。我现在的思想有许多地方跟 10 年前或 20 年前的想法不同，这是我不能、也不愿否认的。然而，我确实想反对这样的看法：仿佛这种思想转变只是反映了由不利于旧观点的环境所引起的心情变化，而谈不上是在多年来事态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信念。

当然，我不得不向抱前一种主张的人承认，我至今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不是一条笔直的、连续的路，也不可以证明它是一条这样的道路。文集中大部分文章的性质已足以说明这种情况。那些作品并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代表纯粹个人的意见，而是一个党人为了给一个斗争的政党的需要、观点和意图作辩护而写的作品。任何一个评论家，只要他知道在一切重要观点上同党一致，那末他就会尽可能地避免强调他跟党内多数同志有分歧的观点。一个党员评

论家，在他的个人意见同党所主张的看法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把个人意见抑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在一定范围内，每一个以党派的权威资格进行写作的、享有这种地位的利益的人，在这方面都会自我克制。对我来说，问题从来不在于从根本上提出一个新的学说，而始终只在于（今天仍在于）对公认的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不同运用；这种情况及上述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文章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对这种不同运用的前后一贯的论述。然而我认为，只要比较精细地推究一下，就会显出这种论述是怎样一步一步逐渐有力地展开的。

这些论文可上溯到1890年——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最后一年。再往上追溯，我觉得就不相宜了。并不是我害怕在今天发表那个时代的作品，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非常法迫害之下，而我担负着表达被压迫党的意见的部分任务。我尽力而为，把事情做到了总算过得去。除了有些我不想再写的东西以外，也有许多在同样情况下我会照旧重写的东西——在今天我还是认可的；而有些东西，我认为就在今天的情况下也还是合适的。只要是在那个反非常法斗争时期产生的，虽然不好但也算是正确的作品，这个文集可没有那么多篇幅容纳它。因此，在文集中我只收入了1890年的若干篇文章，当时社会民主党已经又享有某些活动自由。由于这些文章是在非常法奄奄一息的年代写成的，所以从其思想方面来看却已属于当时已宣告的“新方针”时期了。

其它方面，文章的编选原则是很明显的。在编选时，我首先要受文章的实际内容所左右，力求使这个文集尽可能包括各个方面。所以，有些地方作了删节，我认为也是适当的。并且，在论战性的文章中，有些段落或词句跟所讨论的主题没有必然联系，只是针对

敌手本人而发的，这样就超出了客观实证的范围，把这些统统删掉，在我看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在论战中保持忠实，这向来是我的努力目标。但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却也讲过一些经不起冷静推究的话，而且由于当时的需要或由于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以致错误地进行了一些攻讦或诽谤，事后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即使这类攻讦从主观上讲还情有可原，但是它没有理由不随时代而消灭，否则这就是绝对无法理解的。也有些抨击意见，尽管在今天我同样不再承认它了，但这只是因为我不再抱有、或者不再同样激烈地主张其中表示的实际观点；那么对待这些抨击意见就是另一种做法了。我并不认为修改这些抨击意见是正确办法；我只限于这样做：如果这些抨击涉及的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一删了事；反之，假若谈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就在注解或附录中说明我在多大程度上和由于什么缘故放弃了从前的观点。对于非论战性论述，我也照这个原则处理了，因为上述看法对这种论述也是适用的。

书中的文章分为三组。凡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文章，都归入第一组。第二组包括我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八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这题目下明确表示试图对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那些文章。第三组的那些文章，是在我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出版（一九一九年春）后，为捍卫其中所发挥的见解而发表的。同时，在这三组之内，我尽可能把各篇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然而我有时也抛弃了这个原则，按照主题把彼此有关的文章编排在一起。

关于本文集的出版目的和校订其中收入的作品时所遵循的指导原则就是这些。对文集中所表现的观点，在这里我不作详述，因为文章本身会充分说明。这些论文都是社会主义的论文，文章中有个别论点是而非正统的，但其他论点则完全属于社会民主党旧的思

想范围。即使这些文章只有一部分是反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反对者、保卫社会主义学说的，而其他部分都是要再审查这个学说的，恐怕也不会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仅仅因此对本书的评价就低于一本专供宣传的著作。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学说，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完成的东西，因为它的分析对象本身是某种未完成的、在不断发展中的东西。这种发展的过程使它永远面临新的问题，给它永远开辟新的前景。于是旧的口号失去了大部分意义，不少标题同内容不再一致，传统的图式不再能够应付已经改变的情况。无论愿意不愿意，每个人迟早都会察觉，他不得不凭自己的理性在新的现实和旧理论中相应的原理之间作一番清算。如果当事者自己进行这种再审查，它是内在力量的一个标志，也是任何努力向前的成长中的党不能避开的课题。根据这种观点，我曾在一份英文周刊里谈到去年在汉诺威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辩论；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辩论“至多在下述意义上算是一个危机：就象生物体的发育过程中每一个过渡阶段都伴随着暂时的神经质或敏感性一样”，而这本集子里的自我批评性文章就是当作这样一种过渡阶段的信号而写的，但愿它们为人所理解。

爱德华·伯恩斯坦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

于伦敦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金科玉律

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3
工资铁律的问题	18
一、布伦塔诺论社会民主党和工资规律	18
二、工资铁律	22
三、人口规律	24
四、工资基金理论	33
五、大工业与人口问题	53
六、实践上的结论	62
七、附记：马克思主义对工资问题的讲法的若干缺点	70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86
一、自然科学的国民经济学	86
二、自然原理与经济问题	98
国际大会的能力限度	113
阶级斗争和妥协	121

第二编 社会主义问题

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	141
-----------------	-----

英国农业状况的发展	149
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	164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	181
英国的政党和经济利益	211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	224

第三编 在社会主义中争取自由科学的论战

对一个宗教裁判官的三次答复	251
一、总的驳斥	251
二、对曲解的驳斥	264
三、对立的界限	275
自然界和历史中的必然性	281
辩证法和发展	295
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	322
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	337
驳考茨基的《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纲领》一文	359
结语	369

第 一 编

金 科 玉 律

(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六年)

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一八九〇年)

前 言

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惊人的选举结果，增强了它在德国帝国议会中的地位；选举之后不久，关于庆祝五一节的正当方式的争执也解决了。这样便重新引起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地位及其任务的性质的辩论。本文作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参加讨论，于是继 1890 年 3 月 7 日的《萨克逊工人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之后加入了这场讨论。那篇文章里写道：

“即使我们获得了比现在多一倍的席位，这个议会党团的职责范围也不会扩大很多。既然议会代表着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那么议会党团当然决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它必须永远留在现存制度的圈子里。因而，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制止反动派从我们手里夺走政治统治工具的，阻止他们挖工人的腰包来给容克地主送礼而对工人尽可能地利用社会欺骗。只要想一想我们党的本来目标，便知道以上这些事当然并不算多；不过，这总比毫无作为要好一些。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在现行制度下无法为工人做出更多的事情

了。”

4月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出，这番话就给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派定了一项纯粹防御性的工作；可是150万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本来有责任同时以挑战和进攻的姿态对待统治阶级，尽管提出的要求当然不能是那种以不同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另一种社会制度为前提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决不要求现今的国家去作那种党无法证明国家不破坏社会机体的职能也能作成的事情。”不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仍有比上述引话所划定的范围广阔得多的活动范围；充分利用这个活动范围是党的权利和义务，无视这种义务，会受到严厉惩罚。这个问题是党目前必须考虑的最重大的问题。

在这期间，《维也纳工人报》（当时还是周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从另一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相反地，这家报纸除了别的还主张在议会辩论中要更加强调党的最终目标。这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三篇标题为《暗礁》的文章，然而其中第一篇只是考察党在各个社会阶级中的成长。另外两篇文章及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的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帝国议会开会时提出的一个工人保护法草案）都讨论了上列标题所指的问题，其内容如下：

• • •

—

确实，甚至很难见到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一味幻想我们党在2月20日获得的那将近150万张选票全部是来自那些深信我们的抱负的支持者们。如果我们的敌人摆出一副仿佛他们刚刚发现了美洲似的神气，来显示他们的伟大智慧，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选票

急剧增加仅仅是不满和对立情绪的表现，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选民决不因此就保证赞同社会民主党的“空想的未来国家”，那末我们总是付之一笑。在一定限度内，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们的敌人因此赢得了什么，大概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来。比上述自我安慰更愚昧的安慰，可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投票活动永远只就一部分选民来说才算是对于一种十分明确的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确认，而在多数选民方面，这种活动纯粹是各人当时心绪的表现，主要是表现对某个党派或其代表的信任。对于一切党派都可以毫不例外地这样讲。不过那种衷心拥护者与我们所称之为自由追随者的比数，在任何党派中都不象在社会民主党中那么有利，尽管在各秩序党中自由追随者常常是很不自由的。

我们的敌人宣称，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并不都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国家组织劳动、乱搞男女关系以及他们不管有理无理硬栽到我们头上的其他不法行为的拥护者，可是他们这样说究竟获得了什么东西呢？什么也没有。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惊人一致地在这许多选民面前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计划描绘成一切可恶事情中最可恶的、一切疯狂事情中最疯狂的，然而他们还是投这个党的票；这件事并不会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描绘就失去丝毫对它们的粉碎性打击力量。这件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它们丧失了信任，而把这种信任转移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如果说这一百五十万张社会主义的选票还不算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坚决不信任投票，那毕竟是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绝对不信任投票，而且是对进行社会“颠覆”的党的信任投票。

虽然在我们队伍里没有人不承认这件事，但是仍存在着一种低估它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的危险。

只要党在议会里不过是个微小的少数派，上述危险还关系不

大。无论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是不是情愿，他们除采取一种大体上消极的、抗议的态度而外，基本上就没有很多事可做了。当然，他们从来不是那么死守教条，只限于提提抗议，而是在适当时机提出积极要求参与立法。这种积极行动同我们党对今天的国家所采取的抗议态度倒完全不矛盾，可是它必然缺乏系统性。

顺便说到，不可把社会民主党的抗议态度同譬如什么被非法合并的省区的代表们的抗议、或遭受损害的朝廷利益的代表们的抗议等等混为一谈。这些代表们可以把任务限于否认现存制度有正式权利，而我们呢，我们不是为恢复过去的状况而斗争，而是为了现存制度朝着一个确定方向继续发展，这就是说，我们的抗议不是倒退的，而完全是革命的，如果我们完全放弃积极方面的要求，那末不仅不会加强甚至倒会削弱我们的抗议的作用。

然而，积极和积极也不一样。对现今社会的代表来说，所谓积极地行动就是尽可能地设法确保现今社会的存在，即一方面加强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安于现存制度。当然不能按这种意义来谈社会民主党的积极行动。我们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党；有人说我们是靠激起群众的不满过日子的，这种说法虽然好笑，但是我们确实是处处要依靠这种不满才能得到为更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战士；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先来制造这种不满，因为这种不满固然常常处于潜在状态，却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积极行动目的不在于加强国家权力，而在于加强人民权力，在于使负有进行这种斗争的使命的阶级，即劳动人民，也能够坚定有力地进行这种斗争。因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建设性的纲领是围绕着以下两个主要原则的：在现存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扩大人民的权利和提高劳动阶级的物质生活。

一向如此，今后仍应当是这样。不论我们党在帝国议会里有 10 个或 20 个或 100 个代表，不论有 10 万、50 万或是 200 万选民